

提高农产品质量，满足城乡人民需要，扩大出口创汇能力 农牧渔业部和有关省市自治区签订投资协议 建设113个优质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记者周贻昶)“七五”期间，国家和地方共同投资建设第一批优质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经国家计委批准，农牧渔业部和有关省、市、自治区今天在北京签订了协议。

这批优质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分布在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和七个计划单列市的一百一十三个县(市)，建设项目共六十七项，包括优质大米、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柑桔、苹果、荔枝、龙眼、猕猴桃、西瓜等优质水果，高档名

贵蔬菜，名茶、花卉以及多种名、特、新产品。建设这批商品生产基地总投资二亿七千万，其中国家投资一亿二千万，地方投资一亿五千万元，分三年投完，计划到1988年建成。

“六五”期间，我国各农产品都有较大幅度地增长，十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优质农产品不能满足城乡人民日益提高的生活需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为了提高农产品质量，加快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扩大出口创汇能力，农牧渔业部总结“六五”期间国家和地方联合投资建设六十个商品粮基地县的经验，在去年底广泛开展优质农产品评选的基础上，根据现有基础和发展潜力，好中选优，选择建设一百一十三个优质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

这次建设商品生产基地和“六五”期间建设商品粮基地的做法一样，实行投资和上调产品挂钩，商品生产基地接受国家投资后，按一定比例每年向北京等大中城市提供一定数量的优质农产品，供应市场。

为了搞好商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农牧渔业部与各地协商规定，基地建设投资，不同的项目，不同的品种，可以有不同的建设内容，但重点应放在发展生产，扩大再生能力和产品加工、保鲜、贮藏、包装、运输等产前、产中、产后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方面，专款专用，不准挪作他用。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今年以来，全国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积极采取具体措施，组织县以上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组织学习中，各地从实际出发，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和方法。吉林、湖南、广西等地组织干部下发文件，要求县级以上机关恢复和建立领导干部理论学习中心组，以自学为主开展理论学习。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决定从今年起用三年时间，以各级党校为基地举办短期培训班，分期分批轮训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四川、安徽省委决定采取“小集中”方式，使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每年有一个月到一两个月的脱产学习时间。

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要求，各地在制定学习计划时，普遍注意以经济改革专题来安排学习内容。围绕专题，选读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领导人的著作，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包括这次大会通过的赵总理的报告等文件。学习中，除在自学基础上安排一定的理论辅导外，有的地区还邀请有关部门介绍与这些专题有关的实际工作情况以及理论问题的探索情况。吉林省还要求参加学习的同志开展调查研究，掌握具体材料，以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切实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探索解决问题的新能力。

为了防止学习流于形式，各地都制定了严格的學習制度，要求抓好自学、辅导、讨论、考核等各个环节。吉林、广西等地计划用领导干部读书报告会的形式，检查和督促领导干部学习。

在安排部署各级干部理论学习的同时，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领导同志注意以身作则，搞好自身学习。吉林、辽宁、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恢复了常委学习中心组，制定了学习计划和制度，提出要象抓工作一样抓好学习。

力促领导机关各部门加快工作节奏解决问题 黑龙江省委加强催办检查工作

本报讯 黑龙江日报记者方增恩报道：中共黑龙江省委采取切实措施，力促领导机关各部门加速工作节奏，解决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们专门组成催办检查机构，配备干部从事催办检查工作。在省委机关内建立了常务书记、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多层次责任制，按问题大小和涉及的范围，分工负责催办检查，定期向省委汇报处理问题的结果。去年全省催办事项六百零七件，办结五百七十件，办结率达93.9%。

去年初，黑龙江省委集中精力抓了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先后做出关于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条件、关于加强知识分子培训工作和思想工作等四项决定。根据省委指示，省委组织部组织几百人的队伍深入重点单位检查指导，直接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和要求，对

于检查出来的问题，能解决的就地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造册登记，填写三联单，落实到人头，限期报告处理结果。5月，中组部在黑龙江省召开部分省市组织工作会议，推广他们的经验。

今年1月，省委几位领导同志到牡丹江、鸡西、七台河、佳木斯、穆稜、勃利等市和部分国营农场检查工作，在同当地干部交谈中，反复强调：“中央大政方针早已确定，省委指导和各项章程也很明确，现在的关键是狠抓落实，要多办实事，力戒空谈。”这次调查，他们带回各地提出的二十二个重大问题，回省后，一通报有关部门，并列为催办检查项目，限期拿出处理结果，到作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黑龙江日报》供稿)

胡启立在上海工厂、学校和科研单位调查研究听取意见

深入进行改革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快人才培养

各级领导要与思想文化战线同志共同创造出团结、和谐、相互信赖、相互理解的气氛

新华社上海4月20日电 (记者陈毛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于4月14日至19日在上海视察工作期间，深入工厂、学校和科研单位调查研究，与上海文艺、理论、科技界一些同志座谈，就进一步深入进行经济、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快人才培养和建设问题，充分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胡启立同志说，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只有经常到下面来走走看看听听，了解实际情况，听取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呼声，才能正确地工作，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文艺工作者要立足扎根在中国土地上 反映我们正在经历着的这场伟大变革

胡启立同志在上海文艺、电影、电视界人士座谈会上，就如何进一步贯彻党的文艺政策和“双百”方针，繁荣文艺、电影、电视创作问题，与到会同志展开了充分、热烈的讨论。胡启立同志说，文艺工作者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担负着激励、鼓舞全国人民献身“四化”、振兴中华的崇高使命。希望大家深入

人生活，立足扎根在中国土地上，吸收古今中外的有益经验，把握大局，大胆创作，充分反映我们在经历着的这场伟大变革。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一样，都有个通过实践逐步积累经验、提高认识的过程。党和国家将继续为文艺工作者提供良好的创作条件，创造融洽和谐的气氛，为使更多更好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的作品问世，提供合适的土壤和肥料。

社会科学也要面向改革面向四化建设 通过精神文明建设为新的生产力开道

在上海社会科学界座谈会上，胡启立同志强调说：我国的改革、四化建设需要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也要面向改革、四化建设。他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带来了经济建设上的空前繁荣，更重要的是结束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状态，给了愚昧落后的观念以极大的冲击。我们要通过精神文明建设，为发展新的生产力鸣锣开道，为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铺平道路。要组织力量对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

(下转第二版)

多渠道攀亲结友 多层次广织网络

苏州乡镇企业扩大横向联系

据新华社南京4月20日电 (通讯员郑太白 记者马成广) 人们誉为“施千方百计，费千言万语，历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精神创办起来的江苏省苏州乡镇企业，现在正以这种精神大力开展横向经济联系。同大城市、大工厂、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广泛攀亲结友。

据称，目前苏州市一万三千多家乡镇企业，已有三分之一以上同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特别是同上海经济区各城市开展经济技术联系，一千多

家乡镇企业已同城市经济科技单位结成经济实体。这使苏州乡镇企业在产品质量、技术水平 and 竞争能力等方面进入一个新阶段。

联合投资，合资经营，形成关系密切的经济实体，这是目前苏州乡镇企业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的一个特点。近两年，

这个市的昆山、太仓两县乡镇企业从上海等地引进资金一亿七千万，与对方合资建成一批具有相当规模 and 一定技术水平的生产项目。

以优质名牌产品为龙头，以骨干厂为依托，组织城市工厂、县办工厂和乡办工厂相联系的多层次企业群体或企业集

团，是目前苏州乡镇企业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的一个特点。

从单纯生产领域的联合，向生产、流通、科技、智力开发等多领域联合发展，是苏州乡镇企业发展横向联合的又一特点。目前同各地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实行多种形式、多种内容联合的乡镇企业越来越多，约占到联合项目的半数左右。

“从输入”型向“输入输出”型发展，是苏州乡镇企业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的两个特点。它们一方面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又通过联合，将自己成功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向内地辐射。

“发展旅游事业，重建历史名城”，开封日报上开展的讨论，拨动了他的心弦。他想：“西安有个碑林，作为七朝古都的泮梁(开封)，如果也建一座碑林，雕刻宋代以来名书法家的作品，让古老的民族文化重放异彩，传之后世，不是为古都添添一染奇葩吗？”他的设想，得到了开封市、河南省书画界人士的赞赏和支持。

于是，他着手规划，取名“翰园碑林”。刻碑需资金，李公涛召开家庭会，全家一致同意把一家五口人从事工艺美术、书画装裱、养殖花卉的年收入一万多元，先投入进去。

说干就干。他外出挑选优质石材，寻找刻碑高手；发函邀请名家书法。许都穆、启功、萧萧、陈天华、陈国桢等一批著名书法家的手迹，源源而来。

“翰园碑林”自1985年8月动工，至今3月底，已刻了八十多块。 江苏省书协 高家标

图为老山前线某部战士抓紧战斗间隙，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解放军报 乔天富摄

毁弃信件，贪污、挪用汇款，甚至敲诈勒索群众。这种案件的危害和后果，比一般的贪污盗窃案件严重得多，在国内外造成极坏影响。因此，一定要抓紧查处，抓紧职工队伍的整顿和建设。当然，要注意划清不正之风和违法犯罪的界限，特别注意不要搞人人“过关”。对一般违反职业道德的，要进行教育，帮助提高觉悟。对于严重违法败坏职业道德，情节恶劣、屡教不改的违法犯罪分子，要严肃处理，该开除的开除，该法办的法办，决不可姑息迁就。

尽快制订有关邮电通信的基本法规十分必要。有了基本法规，人民群众的邮电通信活动才有法律保障，邮电职工也有所遵循。我们相信，只要决心大，方法对头，措施得力，邮电通信队伍的建设一定会收到实效，邮电部门的风气一定会好转，邮电职工一定可以无愧“绿衣使者”的光荣称号。

全国纺织行业召开表彰先进大会 九十八名双文明建设积极分子获奖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李安定、本报记者李青报道：从全国五百万纺织职工中推选出来的九十八名双文明建设积极分子今天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纺织工业双文明建设积极分子会议。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和全国总工会负责同志向他们颁发了奖章和荣誉证书。

几年来，全国纺织系统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纺织工业正逐步走向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新阶段。“根根线线温暖着十亿人民的身心，条条经纬编织着共产主义美好前景”，“辛苦我一个，美化十亿人”的崇高思想，已经成为纺织职工具有时代特征的精神风貌。

在今天由纺织工业部和全国纺织工业联合召开的这个会议上受到表彰的九十八名积极分子中，有企业的厂长、党委书记、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和生产第一线职工。其中，有认真端正党风、不徇私情、敢顶不正之风、从而使一个被称为患了“癌症”的落后企业恢复青春的山东德州棉纺织厂厂长王根聚；有在承包国营万人大企业后，坚持“一手托三家，首先托国家”，把职工的热情引向正确轨道的石家庄国棉四厂厂长张俊成；有三十年来，“视名利如粪土，献身科研事业才是最大追求”，为祖国奉献了几十项科研成果的上海纺织科学研究所女高级工程师朱品蓉；有胸怀远大理想，在织布机旁坚持当班二十八个春秋，十年来超产棉布三万四千多米，价值近百万元的长春市棉纺织厂织布工下志云；有年仅二十三岁，在合同工岗位上，以主人翁责任感苦练操作技术，获得省青工操作能手称号的山西临汾纺织厂青年女工吕淑丽等。

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在讲话中称这九十八名双文明建设积极分子的先进事迹和可贵精神，是具有纺织行业特点的共同精神财富。她号召全国纺织行业通过自下而上的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掀起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热潮，为完成“七五”计划建功立业。

邮电部门在公安、司法机关配合下 严惩通信领域违法犯罪活动

查处一批私拆、毁弃信件，贪污汇款，盗窃邮包和敲诈勒索用户案件，依法惩办一批害群之马

本报讯 记者张国荣报道：为了提高通信质量，保障通信安全，邮电部门在公安、司法等部门的配合下，严厉打击通信领域里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查处了一批利用工作之便，私拆、毁弃信件，盗窃邮包、贪污汇款和敲诈勒索用户的案件。依法惩办了一批“害群之马”。

近几年来，为了改善服务，提高通信质量，邮电部门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破坏邮电通信的案件近年来却不断发生，有些相当严重。极少数邮电职工目无法纪，为非作歹。有的乘当前安装电话之机，吃请受贿，敲诈勒索用户。大量至彩电、电冰箱、收录机、小至盆架、工艺品、服装等，用户有什么，他们就伸手要什么。有的内外勾结，盗窃信件包裹；有的盗窃国外信件的包裹，政治影响极坏；私拆、毁弃信件、电报的案情也相当严重。直至把成捆的信件、信件扔进江里，把电报烧掉，后果十分严重。

对于通信领域内的这些违法犯罪活动，最近有关方面进行了严肃处理。上海邮政局通迅员顾志强，三年来私拆、隐匿国内信件九千多封，被判处有

期徒刑十五年。福建邮件转运处押运员卓勤，利用工作之便，连续三年偷窃邮包，价值一万三千多元，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为了保护公民通信自由权利不受侵犯，维护人民邮电信誉，确保通信安全畅通，最近，邮电部决定以整顿邮电队伍，进一步开展端正邮电局风活动，把电报烧掉，后果十分严重。

对于通信领域内的这些违法犯罪活动，最近有关方面进行了严肃处理。上海邮政局通迅员顾志强，三年来私拆、隐匿国内信件九千多封，被判处有

期徒刑十五年。福建邮件转运处押运员卓勤，利用工作之便，连续三年偷窃邮包，价值一万三千多元，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为了保护公民通信自由权利不受侵犯，维护人民邮电信誉，确保通信安全畅通，最近，邮电部决定以整顿邮电队伍，进一步开展端正邮电局风活动，把电报烧掉，后果十分严重。

对于通信领域内的这些违法犯罪活动，最近有关方面进行了严肃处理。上海邮政局通迅员顾志强，三年来私拆、隐匿国内信件九千多封，被判处有

加强邮电通信队伍的建设

本报评论员

“七五”计划最重要的特征,是把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作为第一位任务,使改革和建设相互适应、相互促进。深刻理解中央这一决策的必要性和基本内容,对于正确执行和圆满实现“七五”计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七五”期间把经济体制改革放在首位的必要性

在“七五”期间把改革放在首位,这不是人们的主观意愿,而是由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决定的。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并不理想。究其原因,首先是政治上不稳定。由于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政策,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严重冲击了经济的正常发展,“文化大革命”更是走到了否定生产建设的极端。“左”的思想也渗入经济工作本身,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急于过渡”和生产建设上的“急于求成”,使我们吃了许多亏。其次,是原有的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过于集中的管理,既严重压抑了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又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管理中的主观随意性和官僚主义,致使经济活动达不到应有的效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广泛深入的拨乱反正,坚决摒弃“左”的理论和政策,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及时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制定了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经济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这就为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前提。与此同时,从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了对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农村改革收效极为显著,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还只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要达到预期目标,还需要大量的工作和较长的时间。因此,把改革坚持下去,进一步破除经济体制方面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障碍,就历史地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前进所必须抓住的中心环节。

还要看到,经过前几年的改革,旧体制已在许多方面被突破,新体制的成分逐步增加,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总的来看,如果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旧体制基本上起着支配作用,那就经过1985年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跨出了重要步伐之后,在经济生活中已经开始出现了新旧两种体制同时并存、互相作用的局面。这是前一段积极推进改革的结果,也是今后要集中精力加快改革的原因。在我国国家,由于种种客观和主观的条件,改革不可能也不宜于采取“一揽子”的办法,一举而成,而只能循序渐进,逐步加以实现,以减少社会震荡,增加探索的机会。这样,旧体制的消亡和新体制的形成,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旧两种体制的共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新体制才能完全代替旧体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种体制不分主次并存的状况可以延缓很久。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势必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不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健康发展。主要是一、企业的行为机制难以合理。由于旧体制的束缚还比较多,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还不够;又由于新体制不配套和某些改革措施不完善,

坚持把经济体制改革放在首位的方针

桂世铎

企业已经得到的权益还往往不能正确地加以运用,企业只负盈不负亏、片面追求短期效益的现象很难避免。二、宏观控制的难度增大。一方面旧体制的许多部分已失去效应或者功能大为削弱,另一方面新体制的有关机制又尚未建立和健全,这就形成管理上的某些真空和漏洞,稍有不慎便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控;不法分子也会乘机活动,导致某些混乱现象的滋生、蔓延。三、原有的利益关系已在改革中受到不同程度的触动和调整,而新的利益关系的格局又还没有形成,势必发生一些机会不均等和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引起群众不满,如此等等。这一切,一旦发展到危及经济全局稳定和社会安定时,就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加以控制和纠正,而而又往往强化了旧体制。凡此种种都说明,两种体制用强度大体相同的状况不宜继续延长。因此,必须既明经济规律的正常运转,也将增加进一步改革的决心。这就需要把改革突出起来,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把改革作为整个时期的首要任务,然后用较多时间去充实、完善新体制。这是从根本上克服当前遇到的某些矛盾和困难、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更长的历史跨度上考察,这次经济体制改革,不同于那种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都要经过行的某些环节的局部改革,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经济的运行方式和机制进行全面的改革。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同时在一定范围内也包含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它对促进建设的意义,不是短期而是长期的;它的实现,需要经过周密筹划,采取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衔接的改革措施,而必须集中一段时间全力以赴加以实现。“七五”时期正是这样的关键时期,把改革作为这个时期的首要任务,使建设的安排有利于改革的展开,已是势所必然。这决不轻视建设,而正是为建设长期稳定发展创造条件。

经济建设要适应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

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建设的安排有利于改革的进行,最重要的是,确定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和合理的建设规模,为改革提供比较宽松和稳定的经济环境。总的说来,我们的改革是要逐步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革除原有体制曾得过多、适应过快的弊端,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有计划地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进行这样的改革,必须有财力物力的支持,需要一个供求总量大体平衡的市场。而要做到这些,关键在在于保持恰当的增长速度和建设规模。

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展开,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是不行的。经济增长速度过低,就不可能继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也不可能保证每年新增大约一千多万人口的生活需求和原有人口口

善生活的要求。这样,既无必要的力量支持改革,也难以形成市场供求总量的大体平衡。因此,我们应当在提高效益的前提下争取有比较高的、能够持续增长的速度的。但是,如果超越现实的、可能去追求过高的速度,那就造成经济关系的全面紧张,既不利于改革,也不利于建设。这样的速度即便一时上去了,也难以持久,一旦支撑不住还要掉下来,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正因为这样,“七五”计划在对需要与可能进行认真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确定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7%,其中农业增长4%,工业增长7.5%;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5%。这个增长率比“六五”的实际增长率低一些,但它是切合实际的、有后劲的速度,是有助于促进改革的速度。

要造成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做到社会供求总量大体平衡,必须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国力相适应。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脱离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把投资规模搞得过大,必然使各方面的经济关系绷得很紧,导致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也难以保持,当然更谈不上推进改革了。鉴于“六五”后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不稳定因素需要继续加以消除,中央提出,“七五”前两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体保持1985年水平,后三年视情况再适当增加一些投资。根据中央这一决策,“七五”计划规定五年内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八千九百六十亿元,比“六五”期间增长70%。其中基本建设投资五千亿元,增长49%。在计划执行中,我们必须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务必使投资规模控制在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这是保证改革顺利展开的一个决定性条件。

进一步说,为了适应和促进改革,在建设方面除了要十分注意保持恰当的增长率外,还必须建设规模,整个经济发展战略都必须更好地转到新的轨道上来。因为改革需要延续多年,在这个过程中,人口要增加,生活要改善,为了生产的持续发展,必要的工程建设必须进行。而且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往往要涉及到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为了使这种再分配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必须尽可能在普遍增加各方面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调整。这一切,都要求国民收入有较大增加。说到底,只有较多的新增国民收入,同时对消费和积累的再分配作适当的控制,改革才可能有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各项改革措施的实行才会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而要增加国民收入,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大量增加投入,主要靠增加生产总量来增加国民收入;另一个办法是主要靠节约物质消耗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保持生产适度增长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增加国民收入。前一种办法是过去走的路子,既不利于促进经济的技术进步,又必然要受到物质资源限制的限制。超越物质条件的可能去追求过高的速度和过大的建设规模,将导致经济不稳,也不利于改革的推进。这是不可取的。正确的抉择,是下决心采取第二种办法,即把经济的效益作为中心,通过提高经济效益逐步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也说明,体制模式的转换与发展战略的转变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正是基于这种要求,“七五”计划确定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和建设规模的同时,在建设方针上作了相应的部署:一、把提高经济效

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和相应的措施;二、合理调整投资结构,正确确定投资项目,提高投资效果;三、注意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把经济发展进一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上来;四、以增强出口创汇能力为中心,进一步扩展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五、合理确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使消费积累协调发展。这些方针,反映了我国新的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是今后要长期坚持实行的。而在“七五”时期认真执行这些方针的意义,不仅在于发展建设本身,而且在于使建设与管理相适应,以支持改革,促进改革。

经济改革要适应和促进建设的开展

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一方面要求建设的安排适应改革,必要时建设还要适当让点路;另一方面,也要要求改革应当适应建设,发挥促进建设的作用。我们的改革是在建设过程中展开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建设,它不可能也不应当离开建设孤立地进行。同时,改革需要财力物力的支持,需要通过增加各方面的收益来显示自己的威力,这一切都只有在建设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建设不仅是改革的目的,也是改革赖以顺利进行的条件。

改革要适应和促进建设,首先是改革的部署和步骤要充分考虑建设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有利于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总的说来,改革的效果要以它所能提供的支持比支出得多,否则改革就失去了意义,然而各项具体改革措施的实施,往往要经过不同的时间才能充分发挥。这就有一个滞后期的承受力问题。在一定范围内,为了保证某些改革,建设规模可以适当压缩,但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影响某些必需工程不失时机地及早安排,影响经济发展的后劲。因此,改革也要考虑必需的延迟,在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和经济稳定发展的条件下进行。而“七五”计划正是全面考虑了这种要求来安排改革的,它并不要求今后五年内完成全部改革工作,而只要求大体形成新体制的框架,使经济的运行走上新体制的轨道。这是从现实的条件出发,统筹改革和建设的全局作出的决策,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为了改革适应和促进建设,改革的措施要密切结合和促进各项建设方针的实行,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各项改革措施要周密设计,相互配套,以便使它们的积极作用尽快得到充分发挥,而把互相掣肘和矛盾的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改革的许多具体改革措施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因此要十分注意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以完善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正是改革和建设的总体目标出发,同时充分考虑促进“七五”时期建设的要求,“七五”计划提出主要抓好三个方面的改革:一、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既是形成新体制的中心环节,也是当前为适应生产建设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技术进步的骨干,“七五”期间要提高经济效益和产品产量,改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结构,就必须增强它们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必须完善企业的行为机制,强化企业的自我约束。二、进一步改革社会主义商品市场,完善市场体系。这里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重点是解决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资料价格偏低的问题。这既是为企业造成一个既有压力又有活力的外部经济环境,也是合理调整投资结构、产业结构的重要措施。三、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这是使企业的微观活动符合宏观经济要求的保证,也是“七五”期间控制和调节投资、消费基金和外汇收支,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必要条件。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积极而又稳步地推进“七五”期间的体制改革,是贯彻“七五”的建设方针和实现“七五”建设部署最重要的前提。总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把经济改革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筹划和进行,是“七五”计划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

汉语失客观思想和活动的曲折性。同时对学术界上界过去评价普列汉诺夫“前功尽弃不济”和“晚年不终全与”的错误倾向有所修正。其次,《评论》着重分析了普列汉诺夫一生重大的政治活动和关键的转折时期,将它们置于广阔的政治、历史背景之中,对涉及到的重大矛盾均不回避,使其复杂多变的—生亦内在规律可循,这有助于对普列汉诺夫晚年仍在政治上犯重大错误的同时,在理论研究领域仍能取得重大成就这一矛盾的现象加深理解。再则,《评论》系统全面地把普列汉诺夫的思想理论体系,包括他在哲学、文艺、历史、经济、文化和社会论等方面的著述和贡献比较完整而集中地展现出来。

《评论》对史料考校较认真,叙述客观,并力避曲笔附会之言之。例如,普列汉诺夫死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曾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参加悼念活动,在他们被清除出党后,这竟活动即被长期湮没或改作。《评论》考证了俄文第一手资料,发掘出这些史实,并予以公开评说。《评论》还对国内文献中的译文包括原著者错误之处认真订正,使所收资料可靠、可信。《评论》最后一章,论普列汉诺夫对不被人知的珍贵史料,从而开辟了研究普列汉诺夫的新领域,使人耳目一新。

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

中国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上)



抗日战争是我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参加这次反抗外来侵略的少数民族之多、地域之广、斗争形式之多样和深入,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华中、西南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以后又向我西北、西南等地内侵。在这些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危亡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之下。在中华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积极投入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道,就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热潮,自动组织救国军、义勇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满族占很大比例,有的连满族战士占70%,骑兵第五旅旅长指战员四十人,其中二十人是满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除汉族外,朝鲜族和满族的人数最多,有的民族,朝鲜族战士达半数左右。此外还有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回族,就连解放前夕人口总数只有三百余人的赫哲族,也有不少人参加抗日。东北抗联在长期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民族战士:第三路军总参谋长许海山(朝鲜族)、二军五师师长陈翰章(满族)、远渡南洋家乡的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白族)、父子先后牺牲的鄂伦春族战士李继和和宰柱下布,就是他们的代表。这支部队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英勇斗争,牵制了敌人大量军队,有力地支援了关内的抗日战争。

蒙古族也是反抗日本侵略者较早的民族之一。1933年2月22日,中共内蒙古特委在张家口组织了蒙汉抗日同盟军委员会,领导抗日斗争。绥远地

区蒙古族地方武装—一团部分官兵开赴察哈尔前线,参加由冯玉祥、冯玉祥、方振武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对日本作战。1934年7月,地处哲里木盟的奈曼旗蒙汉人民群众,组织了五支人民的抗日救国军,攻下伪警察署,杀死七名日本官吏。1936年2月,百灵庙蒙政会的蒙古族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举行军事暴动,宣布脱离德穆楚克鲁普(即德王),实行抗日。1937年10月,共产党员杨植青、高凤英(蒙古族)、刘洪德、贾力更(蒙古族)等人,组织蒙旗抗日游击队,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周围和大青山一带开展武装抗日斗争。并于1938年9月,与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会师,编成八路军察绥支队,而后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蒙汉军民坚持殊死斗争,不断粉碎敌人的疯狂扫荡,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根据地。

当日军侵略军进犯到回族居住地区以后,回族人民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帮助下,组成数十支抗日民族武装,投入抗日游击战争中。其中河北有: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定县的回民支队;任丘、肃宁、文安一带的回民支队;雄县、霸县、清苑、永清的回民支队;香河一带的冀东回民大队。山东有:渤海军区回民支队;临海的伊斯兰大队;泰运军分区的回民主力连和回民基干大队;沂水、沂源一带的回民警卫连;冀鲁豫边区有:平汉、沙海、麻海等地的回民游击队。山西有:太行的回民游击队;长治的回民营。安徽有定远县的清真大队。在陕甘宁边区,抗战爆发前,红军中有回民独立支队。抗战爆发后,陇东军分区有回民游击队;三边有回民支队;关中回民自卫队(后改为回民支队)。此外,还有未以回族命名而其成员大部分是回民组成的抗日武装。上述回民人民的抗日武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一部分。各支回民武装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在开辟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与敌人浴血奋战,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其中威震西北的冀中回民支队,在马本斋的领导下,转战冀中平原、冀鲁边和冀鲁豫地区。这支部队自抗战初期建立以来,至1944年调往革命圣地延安,六年中经历大小

战斗三百七十余次,歼灭日伪军三百六十余人,开创了辉煌战绩。冀中军区曾授予“无坚不克、无坚不拔、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的光荣称号。

1944年2月7日,马本斋不幸病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分别送了挽联,高度评价马本斋的革命精神,回族人以及有马本斋这样的英雄儿女而感到自豪。

住在海南岛的黎族、苗族人,在日军大举进犯宝岛时,纷纷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琼崖纵队,在抗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中,作出积极贡献。在土地革命时期曾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广西各少数民族,在抗战中又谱写新章。1939年11月,日军以重兵在钦州和防城登陆,向广西发动进攻。上思、邕宁等十四个县相继沦陷,南宁市被敌占领。中国共产党粤桂南特委在钦州、防城、邕宁、上思、扶绥、武鸣等县,组织了有壮族、毛南族、汉族参加的游击队,开展敌后武装斗争。1944年,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再次向广西进犯。柳州失陷后,我党控制的《柳州日报》社撤到罗城—一带一位佬族地区开展工作,组织起有佬族参加的抗日游击队和抗日大队,战斗在融水、长安、龙脊、罗城一带。生活在防城县江平地区的京族人民于1944年初,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游击小组,并在罗城山上筑起炮台,装上一门大炮抗日军骚扰。广西各少数民族抗日武装在“保卫祖国,保卫家乡”的口号下,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经常截断敌人的交通,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四十二年英勇斗争的台湾高山族和汉族人民,在抗战爆发后,又接二连三地发动反日斗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937年年初的一千三百余名汉族和高山族人民的暴动;1938年初,雾社高山族暴动;1941年3月,台东二百多名高山族反劳役起义等。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配合了大陆的反日战争。

此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红军的土家族、侗族、苗族、彝族、仡佬族、布依族、藏族、羌族、回各族等民族战士,在抗战爆发后,随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华北、华中敌后,参加抗战。西北的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也有不少人来到延安,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的行列。

(马增南)

首钢冶金机械厂

厂址:北京安定门外大屯 电话:461531 转 221或269 电挂:8021

U型轻钢吊顶龙骨

该产品广泛应用于工矿企业、公共、民用设施、宾馆、饭店、影剧院、会议厅等建筑中。具有自重轻、装配施工、节约木材、密封性好、抗腐、耐久等特点。并备有不上人龙骨吊顶、上人龙骨吊顶、承重龙骨吊顶,供客户选用。我厂可按用户要求代配石膏、钙塑、发泡等装饰板。欢迎用户大量订货。价格合理。

卷帘门窗

本产品分手动、电动、遥控三大类。材质分为轧制合金铝(本色及氧化着色)镀锌板。特点:采用上下启闭式,操作灵活简便,造型美观大方,结构先进,价格合理。该产品适用于商业、宾馆服务业、工矿企事业单位使用。

Y型轻钢吊顶龙骨

STM型

出版事业的发展大有希望

在全国图书展览开幕之际

我国新时期的出版事业，在党的正确指引下，恢复和发展很快，已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正在举行的全国图书展览，生动地展现了这一事实。

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建设的新形势，把出版工作推到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我们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出版工作，规定了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使出版工作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版工作要进一步发挥这个作用，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进一步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为人民提供积极的、健康向上的各类文艺、文化娱乐读物，特别要提高通俗文学读物的质量，以抵制庸俗低劣文学的泛滥；积极促进对外科学文化的交流，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宣传我国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增进相互了解。

当前，在大力发展出版事业面临着“一个重要课题”，那就是如何认识图书的商品特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给出版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

图书虽然是一种精神产品，但它是具有物质形态存在的，归根到底也是一种商品，同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两重性。因此，图书生产与其它物质产品的生产一样，必然要受到价值规律的制约，使图书生产者不得不对图书生产投入与产出的比较，考虑其经济效益。然而，图书毕竟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它是精神产品的载体，能够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生活，具有社会效益。尤其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革命性，不应单纯地考虑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因此，出版部门要进一步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的关系。图书出版既要面向市场，

又不能完全由市场来调节。所谓要面向市场，就是出的书总要卖得出去，要根据读者的需要来安排。因为从总体上讲，广大读者对图书的需求反映了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之所以不能完全由市场来调节，是因为有一部分读者的需求，代表了社会上落后的思想意识。因此对图书市场要进行分析，不能盲目地跟着市场的需求转。同时，由于图书这种商品的特点，市场的需求量不能完全反映一本书的价值，如果完全由市场来调节，许多很有学术价值的书就得不到出版机会。

由于图书是一种特殊商品，我国图书的定价也不能完全按实际成本加平均利润来计算。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一般出版社只能在总体上坚持保本微利的原则，有很多书刊赔钱也要出版。有不少出版社由于专业分工的限制，在总体上也难以做到保本微利，需要给予补贴。

在这个问题上要克服两种片面性。一种是只讲社会效益，不承认图书的商品属性，不重视价值规律对书刊生产的重大作用，不注意经营管理，甚至“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躺在国家身上，影响了出版事业自我发展能力。离开这一点讲社会效益，只能是一句空话。另一种片面性是，把书刊等同于一般商品，甚至不讲社会效益，片面追求利润；或者把书刊出版混同于一般工商业，在经济政策上不加区别，增加了出版部门的经济压力，这都不利于坚持出版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

目前，出版部门的自我发展能力很低，生产设备相当落后。我国书刊印刷厂的设备，五十年代以前的产品占一半以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产品还不到一半。由于印刷生产能力不足，出书慢的问题十分突出。现在一部书稿从出版完成编辑加工到印刷厂印装成书，一般需要一年左右，有的则更长。这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很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出版部门要通过改革，加强经营管理，在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的前提下，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自我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各界要支持和扶植出版事业的发展。出版工作的状况，直接反映着并影响着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水平。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出版事业都很发达。出版界的同志要牢记，财政部门应当继续给出版事业以有力的支持。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生气勃勃，蒸蒸日上，呈现出光明灿烂的前景。作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出版事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我相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出版工作面临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出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新桥”难新人间情

范 煤

一口气读罢从维熙的《断桥》（载《中国作家》1986年第一期），尽管小号字叫我看得头昏脑胀，我却还面对着稿纸两问题记发愤。

“任何哲人的滔滔雄论，都不如生活对他的富有。”这是两句普通的话，并没有什么深奥的哲理。可是，我仿佛还在不断看到作品中栩栩如生的朱雨顺、徐虹、叶涛、梁仪、庄华这一群“真正的人”充满激情的形象在我目光中闪现。他们悲惨、壮烈的坎坷经历，震撼人心的遭遇与命运，真挚美好的形象在我目光中闪现。他们所展示的生活绝对富有，也显示了这些人物的心灵、精神世界的绝对富有，给我枯老的心灵增添了不少的活力！

我忘不了作者在作品最后描绘的那幅白粉画，那带有洞孔的绿色铜盖的花盆中“婷婷玉立着一束鲜花”，“叶片上滚动着……有情情的晶莹欲滴的雨水”，以及“在这烟雾间，我久思而无所得的题眼目脱然而出：《断桥》”的描写，以及画家老梁之口说出的这段话：“因为你参与了筑京内圈铁路的艰巨工程！而最后终于塌方断绝，美好这幅画对你有所安慰！”我觉

得这就是作者近一年的辛勤劳动中洒下多少泪雨的血泪结晶之结晶，既是一种自我安慰，也是对那些饱经坎坷的人们一种真挚的慰问。恐怕也是更重要的，是一种凄婉的请求。正如作者叶叶涛所表述的：“我理想从梁仪二十多年熬苦含辛地搭一座断桥落堡，用几个人的快活，勾画一幅历史的几个生活图形，让人们去求证。”

这部小说的成功，之所以震撼人心，正是通过朱雨顺和徐虹的偶然的邂逅，而终于陷于无法摆脱的命运、共生死地地。而无论是梁仪、叶涛、庄华这些真正的男子汉怎么熬苦含辛，也改变不了他们的悲惨命运，让我们不得不去求索一个答案：在中国几亿人口的伟大的民族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十年动乱这样一个灾难性的断桥断绝？

朱雨顺和徐虹之间不能建立起来的鹊桥，仅仅是他们个人之间爱情的桥梁么？恰恰相反，他们的爱情正是要建立在一座更宽广、更深厚的社会主义巨国的桥梁，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不幸的桥梁。如果他们为祖国失去了爱和理想，能不有所感，我作为从维熙同

他们就不可能在悲惨的命运中顽强地滋长着如此真挚的爱情。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塌方不是埋葬了个人的爱情和幸福，几个人的生命，严重的制造了我们下一代年轻人精神上的断裂，丧失了对祖国之爱，对理想的幻灭。

当我看到这个可爱的老小刘小飞——因为她骑车越轨招来车祸，也招来了她母亲徐虹和朱雨顺的偶然相识，使徐虹发现了这个真正的男子汉，倾注了真挚的热爱——最后当母亲即将去世的时候，她这个“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却产生了生她生父到国外去，“离开生养我这片土地”的念头，我当时心头上猛然打了一个冷噤。

多遗憾作者笔下留情，小飞终于还是留下来，留在了朱雨顺的身边……但是小飞留住这一段的描写，的确使我感到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涩，使我热泪盈眶……作者固然好心地弥补了这“小飞精神上的断裂，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三十多岁的老姑娘，老小们认为，他们心灵上依然依然残存着一片“冷”，还有多少呢！

当然，参与搭鹊桥的当时代人，梁仪、叶涛、庄华，他们与朱雨顺血肉相连，同甘共苦相连，又岂止仅仅是为了朱雨顺和徐虹两个人的爱情？例如庄华亲眼目睹在朱雨顺自己的炮火下埋葬了黎玲老三代亲人，认为朱雨顺这个伟大战士“谱写了我国战争史上，舍私为公最壮烈的一页！”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将领，对朱雨顺的个儿生活态度和命运能采取冷漠的态度么？难道庄华“矿并亲于朱雨顺解除镣铐，不正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正义和友情的表现么？”

再如梁仪和叶涛为朱雨顺这个“煤的性格”，从认识到理解，而后发展到息息相关、无微不至地关怀，不正表现了我们过去战争年代人们用鲜血凝结成的优良传统，反叛提倡的“聚族而居，专门利人”的精神么？这种精神是真正无产阶级战士精神的升华，经得起任何严重的塌方。

因而，我读罢《断桥》，有所感，我作为从维熙同

住“三角梅”这一象征物，“那紫红色的不是花，是片片绿叶，有一朵小黄花包在当中。”“这三片紫红色的叶子，保护了花，人们才把它也叫作花，才注意它……”这既是战士对党的歌颂，也把战士美好的内心世界向人们敞开了。在《政委的秋天》中，政委的妻子种苦瓜，苦瓜成熟了裂开了，”那是相思豆般红晶品的种子，一个，两个……在秋阳里金光闪闪”的描写，也是画龙点睛之笔，是个人的夫妻之情、热爱祖国之情，娓娓道来。

王中才的作品有思想深度，是因为他跟时代的弄潮儿一道奔跑，一起思考；他的作品充满了激情，是因为他植根于大地，植根于火热的军旅生活，植根于人民之中；他的作品境界小而不大，含蕴深远，是因为他对更高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境界有执著的追求。从作品中我们能清楚地感觉到作者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深刻地表现时代精神，他不怕吃苦。海防上的小岛，他去过；西北的大戈壁，他生活过；黑龙江的大山，他爬过。听说，最近又去了北大荒，要写写军垦战士的生活。这个兵啊，一直活跃在前线战士中……

关于方法论问题的争鸣

——近年来文艺理论问题探讨概述之二

白 桦

方法论问题，实际上是围绕“系统科学方法论”（包括系统观、控制论、信息论）而展开的。系统科学方法论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来考察，其方法包括整体性、结构性、有序性、动态性、相关性等原则。它是现代科学向整体化和综合化方向发展的反映。关于这一方法在文化学中的运用，大体上有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系统科学方法在文学研究中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它要求从整体上把握对象，有利于培养人的直觉能力；它强调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来把握对象，具有多维多向的开放性；它还能使文学在已有的定性分析之外实现定量分析。引进和运用“三论”是现代社会科学向文学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文艺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另一种意见认为，把现代科学的方法

志这部作品的成功而高兴，也为他这种求索精神所感动。我钦佩作者的勇气和功力——他塑造了许多令人信服、真实感人的形象，包括那个觉醒过来的于江，那个虔诚歌颂“文化大革命”却被打死的女校长，以至那个“身上还保留一颗中国的黄土地之魂”的刘梦虹。然而，最宝贵的，是作者给我们来到一种“煤的性格”：“它在地下深埋得越久，燃烧的火力也就越旺！”这正是朱雨顺性格的特征，而又富有鲜明个性形象的魅力。而在梁仪、叶涛、庄华身上也同样有着这种越燃越旺的火力；就是那临死前还声称儒弱的徐虹，也在珍贵的遗言中表现了煤的性格。她面对死亡并不表示遗憾，因为她终于“懂得了男子汉三个字的真正含义”，有了一个“我心上真正的亲人”。

这些“煤的性格”，既表现了在历史上出现严重的塌方断裂，怎样残酷地践踏了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给他们造成了多么痛心的血泪淋漓的命运；也真叫人感到他们燃烧的火力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力量和希望！——这就是社会主义文学中永远不能扑灭的真实的人性、人情、革命人道主义的火焰！

可是我们也不住要呼吁：我们千万千万不能以此自满，煤的性格既然如此，多大的塌方也埋不住它的火焰，就再继续往下深埋！人终究不是人，而是煤！作者也不是在挖煤，而是在挖掘我们人的心。

单就作品的结构来看，人物关系和命运的交叉、互为因果，时间的交错和转换，情节的发展富有传奇性，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无非是尽可能让每个人物以第一人称为“我”，用叙述来叙述自己的遭遇和感受，使我们感到更加真实、亲切，更容易透过他们的心，更深刻地理解他们那么丰富、善良和美好的心，也使得我们得到了享受。

我这篇读后感，只希望起一个小小的作用，能促使有情人人都读一下《断桥》。也表示我一个小小的祝愿，尽管我坚信断桥难断有情人，也希望在我们前进的历程中，切不要再出现这种无情的塌方断裂的悲剧！



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主办的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讨论会，最近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民族文学和汉学的理论、评论家和作家，怀着改变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研究薄弱状态的责任感，认真进行了讨论。

与会者认为，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整个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两个文明迈进的形势下，少数民族文学要取得具有历史高度的自立地位，当然不能再满足于在创作中仅仅表现对民族性的单向把握，必须同时坚持在作品中转入他们的时代使命感、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三个基本支撑点。

与会者还就如何打破阻碍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传统封闭圈，如何在宏观指导下，少数民族文学要取得多角度全方位地表现民族生活，如何提高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综合素质，如何在宏观研究的指导下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微观研究工作，如何建立一支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队伍相适应的少数民族文学评论队伍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评论边）

方法已失去效用，应予更新；有的同志认为，所谓新方法，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中早已有的东西；有的同志认为，新方法为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之嫌，应当警惕；有的同志认为，新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个丰富，值得欣慰。

新方法论的进一步深入，也触及到了科学与文学关系问题。一种意见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目前正走向一体化，诗与科学的统一，是艺术与科学的对立统一运动的必然逻辑。二者统一的直接形式是两种符号系统的统一。现在，某些数学门类已经能够描述复杂的生命现象和现代艺术表现出的高度抽象性、象征性，就已预示了这样的趋势。一种意见认为，为自由的、丰富的人的精神世界所决定，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是直观的、审美的、理性性、纯客观地观照审美对象，难于发现美、把握美。而且生活中也需要一些非科学、非理性的东西，艺术还需在因此，目前还看不出科学与文学统一的可能和必要。

王中才本是一位散文作家。他出版了散文集《何处是天涯》和散文诗集《晓星集》、《光斑集》等。近年来他从“笔触”到小说阵地上，还写了一束报告文学。但他在文界引起注意，却是在他以《三角梅》获得了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他以《最后的虹》又一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于是人们不免要打听：这个王中才……

他，地道的山东大汉，尽管生在大连海滨，八岁才回山东老家，他的刚毅又一代财经学，就放下笔当了兵。当兵后，再拿起笔时，就不再写数学和统计学的文章了。他笔下写出了清冽的小溪，他钟情于文学这个美丽动人的“灰姑娘”。

近年来，我国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军事文学也放出了夺目的异彩，无论在题材上、主题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有相当广泛而深入的开拓。在这一散文创作的文学新潮中，王中才坚持持在前头的尖兵之一。他善于冲中“最后的虹”，探索战争中的道德观念问题、人的价值问题。他对军外的改革也予以热情的关注。他直面现实，力求在生活的阵地上站得靠得住，反映得及时一些，新鲜一些，深刻一些。在当代军事文学创作中，一些严肃的作家，不为流弊时风所左右，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反映当代军人的高尚风貌，努力描写历史变革期军人生活的心灵史。王中才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有自己努力的成绩。中篇小说《黑马》巧妙地解剖了现代军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录下了战士灵魂感情撞击的铿锵之声。那里，有对得天独厚地充满了男子汉优势的新思维的严厉的道德谴责，也有对“黑马”连长耿大耿的自卑、自卑的痛惜和批评。短篇小说《最后的虹》在反映战争题材方面，有明显的突破。在我戎马部队被敌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伤亡很大的关头，到底能不能因为一个战士冲入敌群而拒绝他火支援？应该说，这是一个在感情领域极为敏感的问题。王中才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借描写一场战斗，给我们一个重新思考这冷峻的“战争”的机会。意味深长的，小说中的军长以跨越“最后”道虹线”时，举步艰难，只好牺牲结构的完整，以满足战士们感情上的需要。这里军长的撤掉团长赵树和《黑马》中对连长的任命，让我们听到了对军队生活中的改革的呼唤。

在艺术观念更新方面，报告文学《太平》是值得注意的。作品描写了气魄宏大，胆略惊人的社会主义企业家、“九条军龙的龙头”徐行。徐行那对传统的岐黄商业的观念的抨击，那对“经济低劣”的想象，那对“延安精神”的认识，那秘密又难一举夺得wp产品引进权的狡猾和干脆，还有那对比外商还难对付的官僚主义工作方式的忿慨，反映了作者迅速把握新生事物的能力和胆略。中篇小说《远岸》，以其真实、感人的力量，娓娓道出了人生道路选择上的深刻哲理。赵茹本已靠在岸上，

这个兵，活跃在前沿阵地

——漫话王中才的小说和报告文学

李 下

却又被那风吹入迷津，这教训对许多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青年人则是可贵的。至于《蓝蝴蝶的翅膀》和《夏天的红字》是则表达了对作家对社会主义人生价值深刻而严肃的思索。

文学作品是情感的表达，作家的真情亦往往是作品艺术价值的载体。王中才对军人，对军军生活，对人民，充满了深情。这种爱，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他有一个习惯，在大部分作品开头都写下了献辞，从中可以映照出作家那拳拳眷眷之心。在描写军人家庭生活中的悲欢离合的小说《远岸》的篇首，王中才慷慨了这样一行字：献给战士的慈母和贤妻及爱情的恋人们！在《三角梅》的标题下，作家写道：“谨以知识，祭奠我偶然间知的一位年轻的烈士。”在描写“文革”中知识分子遭遇的《龙风观》的开头，作者也有深情的寄语，献给敬爱的老师。除了献辞，作家的情节中也有动人之处，拂人情怀。《政委的秋天》中的李光祥被捉，来米来同妻老、孩子一起过春节，却能为丰富战士们那过于单调的生活而去采摘野花。王中才在《远岸》中，一直细腻地爱着战士李月海的女刘西，主动承担了抚养李月海遗孀后留下的婴儿的描写，刘西去马踏岛上主动的描写，都是至情之笔。

王中才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他不算高产，却在艺术上有韧性的追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善于发现美，也善于捕捉美，也许正是得力于他散文创作的实践，他的小说有散文“意境”的韵味。当然，这也有别于那种小说“散文化”的倾向，为了追求散文化而流于空灵、淡化。王中才的小说优美是基干对普通人和普通心灵的开掘和运用，使读者捕捉到一种深植悠长的内涵。在《三角梅》中，他写战士贺振木，“那战士刚刚站到了不远处一丛鲜绿的灌木中，正面对着她，象一尊尊中泛青的铜像，给人强烈的动人的美感”，只几笔，就绘出了一幅极美的图画。

王中才的作品艺术上有特色的东西是不少的。他结构作品的方式和叙事的方法，总是力图作出新的尝试；他对大自然的钟情和大自然在他笔下的地位和形象，也很值得琢磨；他的心理描写和肖像刻画等方面也自有其独特之处。但难以突出之点是，他未能对娴熟地掌握和运用“象征主义”这一艺术手法。象征手法并非是什么新鲜东西，人们都在使用。但象王中才这样把象征手法贯穿在自己的大部分作品中，则不多见。这使他的作品加深了意境，增大了思想容量，在浪漫主义的色彩中，事物从优美升华为崇高。例如，王中才在《三角梅》中紧紧抓

中国机电设备公司华东产品管理处 华东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宗旨：用户第一 信誉第一 热忱为广大用户服务

本公司经营华东地区及全国名牌优质产品，并兼营东欧国家进口机床，资源雄厚，品种齐全，欢迎广大用户来人来函来电办理订货手续。

国内品种：金切机床、锻压机械、木工机械、铸造机械。

进口机床	立式铣床(民主德国)	SU140/1000	普通车床(捷克斯洛伐克)
FSS 400/1600/2 PS	卧式铣床(民主德国)	SU140/1350	普通车床(捷克斯洛伐克)
BFT 90/2		SU140/2000	普通车床(捷克斯洛伐克)
BUC 630A/4000	万能外圆磨床(捷克斯洛伐克)	SV18RA/750	普通车床(捷克斯洛伐克)
ZSTZ 315 C 3	磨齿机(民主德国)		

SV18RA/1000 普通车床(捷克斯洛伐克)

SV18RA/1250 普通车床(捷克斯洛伐克)

CNTA 3150/10 磨齿机(捷克斯洛伐克)

CNTA 3150/16A 磨齿机(捷克斯洛伐克)

LDDA 125 磨齿机(捷克斯洛伐克)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帐号：5427074 地址：上海四川中路410号 电话：219128 213470(总机) 电挂：0451



